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 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历史话语与 宪法概念(1750-1789)

黄艳红

【摘要】在1750年代法国的“宪政危机”中,各派政治力量试图以历史来阐发各自的政治理念,这表现为它们对法国历史的不同阐述。勒佩奇、莫罗分别代表法国高等法院的传统宪政主义和绝对君主制的历史-宪法理念,而马布利笔下的法国历史则预示着民族革命对政治生活的重塑。但对于长期引领公共舆论的穿袍贵族而言,这一超时间的、非演化性的宪法不仅有抵制王权专制的政治性色彩,同时也有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秩序的一面。这种保守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舆论战中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志在革新现有政治-社会体制的革命者强调法国过去没有宪法,应该创制一部宪法。他们不仅以自己理解的自然法重新定义了宪法概念,这个宪法的“零点时刻”也意味着民族集体生活的重启及与历史的决裂。

【关键词】历史;宪法;概念史;旧制度;法国大革命

【作者简介】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国史(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3.7.96~108

本文考察的是法国从1750年代到1789年颁布《人权宣言》期间,政论界有关“宪法”概念的话语。根据保守主义鼻祖埃德蒙·柏克的见解,不尊崇传统而凭抽象原则制定法律,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错误之一。<sup>①</sup>不过在本文的考察时段内,历史几乎一直是法国宪法话语中的核心要素,但论者是以不同的历史观来论证其宪法观念的。这种话语策略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发生重大转向,新教牧师拉博-圣埃蒂安的著名口号——“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Notre histoire n'est pas notre code)<sup>②</sup>,标志着法国宪法概念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以历史为论据的宪法最终让位于以理性和自然法为基础的宪法。这个转变在多个方面体现了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革命之母的特征。

在国际学界,关于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宪法问题已经有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研究。1927年,法国学者卡尔卡松那发表《孟德斯鸠与18世纪法国宪法问

题》,以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为核心,探讨了18世纪法国思想界在宪法、历史和权利等问题上的论争。其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了革命前夕法国围绕宪法问题的舆论战,标题就是“特权与自然法的战争”。<sup>③</sup>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革命史研究中“语言转向”的代表者基思·贝克对法国历史与宪法的不同表述、革命初期围绕“制宪”的争议等问题,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sup>④</sup>法国学者马丽娜·瓦伦西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关于法国宪法的辩论,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作为法律史转折点的意义。<sup>⑤</sup>国内学者中,高毅教授曾论及18世纪詹森主义者对法国宪法概念的重塑所作的贡献。<sup>⑥</sup>笔者将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历史和宪法论辩出发,结合当时的一些具体议题,运用概念史的方法,透视历史在法国宪法话语中的使用及其特征,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夕宪法话语的转向及宪法概念的重塑。

## 一、历史构建中的法国宪法

18世纪50年代,有两个事件推动了法国公共輿

论的政治化:一个是围绕詹森主义展开的宗教和政治斗争,另一个是税收新政引发的争吵。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核心角色是以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为代表的司法贵族,他们的言论在公共舆论中激发了关于宪法的辩论。<sup>⑦</sup>在这些辩论中,历史成为各方的重要论据。但是,不同的作者在运用历史时,出于不同的政治意图而对法国历史采取不同的表述,考察这些表述有助于理解当时法国人对宪法和权利的认知。

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仍然是法国政治论战的主要意识形态资源。据研究,在18世纪的私人藏书中,四分之一可以被归类为历史著作。<sup>⑧</sup>通过对整个18世纪法国出版的著作的标题进行分析,表明历史书始终占有重要地位。<sup>⑨</sup>因此,革命前夕有大量小册子围绕历史展开政治论争,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现实政治局势的变化促使人们发掘这个“武器库”,而这种努力又基于一种普遍的意识:历史记录是善治之源。路易十六继位时,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就向国王解释过这种关系。“国家的历史和公法的基础在于文字记录”,“要了解这些记录,就必须收集它们,而且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认识它们”。<sup>⑩</sup>

1750年代,法国政府大臣的主要政治对手,即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后者经常批评前者在强化“大臣专制”——已在广泛搜集历史记录,对法国历史的再现和记忆的争夺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sup>⑪</sup>基思·贝克介绍了当时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情况,并集中分析了三个代表性文本,即高等法院的理论家勒佩奇(Le Paige)的《历史通信》,绝对君主制的辩护者、王家史官雅格-尼古拉·莫罗(Jacob-Nicolas Moreau)的《道德讲座》,以及古典共和主义者马布利的《法国历史评论》。三人都试图通过讲述法国历史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文侧重探讨这些法国史版本所阐发的“宪法”概念。

《历史通信》采用18世纪常见的通信体,由一系列阐述法国历史的信件构成。这些信件是勒佩奇写给一位假想的通信人的,后者请他阐明各高等法院

的“宪法”地位。概而言之,勒佩奇在阐述法国史时,强调古代宪法一以贯之的持久性,反复使用主有代词“我们的”来强化对历史延续性的认同,如“我们的君主制”。在谈到高等法院的宪法地位时,他认为应“回到我们最早的时代……回到我们最早的襁褓期”,即“我们的君主制在克洛维(Clovis)之前的状态”。他讲述了法兰克人进入高卢时的法律和制度,认为那时法国君主制的根基就已经奠定,“我们国家的所有基本法,我们公法之中最珍贵的部分,尤其是高等法院的源头,都应追溯到这最早的时代”。<sup>⑫</sup>所以,法兰西民族的宪法从一开始就已定型。同样,法兰西君主国的基本政治形态在开始之时就已确定下来。“我们的国家”是一种已然成型的秩序,国王、高等法院、民族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下来。

为了论证这些观点,勒佩奇展示了一些权威史料,包括法国高等法院的法令登记册《往事记》(Olim)。他试图证明,巴黎高等法院和法兰克国家的早期制度之间存在不曾中断的连续性。中世纪的高等法院(Parlement)与法兰克君主制的两个早期大会是一体的,此后的高等法院则继续行使着这两个大会的职能。他提到的两个早期大会,一个是国王的宫廷会议(Cour du roi),由民众选举的诸侯组成,负责协助国王处理司法事务;另一个是民族大会(Cour de la nation),亦称国民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或议会(parlement),与会国民协助国王在该会议上行使立法权。勒佩奇说,当法兰克人在高卢定居时,召集所有人参加这种大会已不切实际,与会者逐渐限于王国的主要人物,于是全体议会成员及其职能与宫廷大会的成员和功能逐渐无法区分。在封建时代,这种混合情形更加明显,两个会议合并为一个单独的机构,这就是后来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从14世纪初就常驻巴黎,《往事记》所展示的就是这一连续性的制度发展。<sup>⑬</sup>

上文对 parlement 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实际上,作为政府机构的 parlement 直到1200年左右才出现,而且其主要职能一开始就是司法方面的,故一般被

译为“高等法院”。<sup>⑭</sup>不过这个机构自始至终都不是纯粹的司法机关,早期曾认为与古罗马的元老院有渊源。<sup>⑮</sup>勒佩奇则将高等法院的源头放在中世纪早期,即日耳曼征服和法国君主制诞生的时代,尤其重要的是,其职能并非仅限于司法方面:

今天我们看到的 parlement,就是美男子腓力、圣路易和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那个 parlement,我们还有它的记录。同样,这三个国王时期的 parlement 与罗贝尔(Robert)国王及其先王时代的 parlement 是一回事;与查理曼和整个第二王朝、与克洛维和整个第一王朝的 parlement 是一回事;与塔西佗在1600年前描绘的 parlement 也是一回事,那是我们的日耳曼国王时代,它们的源头就是我们国家的源头。<sup>⑯</sup>

这段话足以表明,勒佩奇的论证有不少对法国历史一厢情愿的解释,但他的论点能够支持法官们的权力诉求:高等法院集中了司法权和立法权,这两种权力可追溯到君主国的初创时代。高等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构,与国王一起行使审判权;作为民族大会的后继者,还参与国王的立法行动,通过辩论、核准和登记等程序赋予公共意志以法律效力。这两种职能构成传统宪法防范王权专制的支柱。这样的论点为高等法院对抗王权及“大臣专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sup>⑰</sup>

勒佩奇所表述的法国宪法,意在突出高等法院的核心地位。不过,就法国宪法的时间性来说,与其说它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超越时间变迁的抽象概念。国王、民族和高等法院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他的著作虽然托名历史,但正如瓦伦西所言,这种历史是“空洞贫瘠的”(barren),一切都已在君主国诞生时就注定了。<sup>⑱</sup>

在勒佩奇的宪法观念中,法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三级会议被隐没了。这受到了马布利的猛烈反击。<sup>⑲</sup>马布利提出了一个与勒佩奇针锋相对的历史版本。在他看来,法国历史不是一个稳定、连续的宪法故事,而是一连串的动荡或“革命”,révolutions 取代了勒佩奇钟爱的 constitution。在马布

利的笔下,法国政治史充满了动荡和失序,从来没有产生稳定的政治原则,从来没有建立保障人民自由的秩序。法兰克人最初是个好战的野蛮民族,直到查理曼才恢复统一和自由,出现了三月校场(Champ de mars)的民族大会。随后的封建体制摧毁了公共秩序,虽然封建时代出现了三级会议,但它错失充当国民意志表达工具的机会,高等法院篡夺其作为民族代表的角色。

马布利对勒佩奇的论点进行驳斥:高等法院所谓限制王权的理论主张,根本不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而是以空洞的口号捍卫团体私利。马布利尤其嘲笑勒佩奇捏造出的历史和宪法的延续性。在马布利的概念中,一个民族的基本法不是其最早的法律,而是赋予其政治生活常态的法律。但法国历史上演的并非成功的宪法故事,而是不断重复的政治失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法国人不能行使稳定、持久的民族意志。不过马布利给出的一个预测:召开三级会议时,法国民族就应该把握时机,恢复对其政治意志的行使并使其永久化。因此,这就是法国真正获得宪法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布利的著作预示着1789年的创举,基思·贝克将其视为法国大革命脚本。<sup>⑳</sup>而马布利有关历史变动性的阐述,不仅可以佐证宪法的可变性——这与勒佩奇迥然不同,而且可以为修改宪法提供依据。<sup>㉑</sup>如果将马布利的宪法概念与他法国历史的描述进行比照,就不难发现,实际上法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宪法,1789年的革命者将会再次强调这一点。

尽管勒佩奇和马布利对法国历史的描述和各自的政治观念相距甚远,但他们的理论都对绝对主义王权构成了挑战。王家史官莫罗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公共舆论中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法院贵族给王权造成的难题。对于1750年代“宪法危机”给法国的政治气候带来的转变,莫罗做出了准确的诊断:政治作为“国王的秘密”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在新的环境中,政治已成为公开论辩的议题,意识形态争论要求王权调动有利于其权威和政策的各种象征资源,而这些资源应该内在于绝对君主制

的历史、法律和传统之中。<sup>②</sup>

莫罗关于法国历史的主要观点体现在《道德讲座》中。他阐发了一种既不同于勒佩奇也不同于马布利的法国历史,将绝对主义和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结合在一起。在莫罗的笔下,法国历史也是开始于法兰克人穿越莱茵河之时,但这些征服者带来的只是些野蛮的习惯,是罗马人的遗产教给了他们“理性、人道和善法”。如果说勒佩奇和马布利对法兰西君主国的源头是持日耳曼主义论点的话,莫罗则堪称罗马派解释的早期代表,绝对君主制的辩护者经常支持这种解释。莫罗否认早期的法兰克大会有立法权威。在他看来,法国历史是一连串立法权威丧失又恢复的故事,这与有马布利相似之处。他同样认为,丕平上台后,新王朝才恢复君主制的权威和活力。莫罗也称赞查理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是开明的绝对君主的典型:“因为他保持了权力的称号和全部的实权,并净化了权力的实施。”<sup>③</sup>

考察三位作者对查理曼的再现是件颇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位花白胡子国王对他们而言,都是政治典范。勒佩奇描绘的查理曼,其权力受到司法机构和立法大会的限制,这是勒佩奇理想中的法国宪法的表现,也是对当代国王的警示;对于马布利,查理曼是恢复人民自由和团结的民主派君主;但在莫罗那里,查理曼综合了主权意志和理性建议,不是在民众大会上而是经验丰富的官员们中寻求建议,因而能行使一种“虽然绝对,但本质而言也很开明”的权力。<sup>④</sup>在完美的绝对君主查理曼之后,法国人民的自由随国王权威一起消失了。只有等到作为主权者的国王恢复其权力,即国王和市民的联盟战胜了封建制,法国人民才能重获自由。国王的司法随高等法院而逐步扩展,国王的财政力量因向三级会议求助而增强,但这两个机构的存在都依赖于国王权力的复兴,而非任何与法兰克大会相关的历史或宪法纽带。“权力必须是单一和绝对的,如此自由才有保障,财产才能安全”<sup>⑤</sup>,这是对勒佩奇的驳斥。与马布利不同,莫罗认为封建时代之后的国王把握了时机,通

过扩展王权而逐渐增进臣民的自由。亨利四世和黎塞留(Richelieu)根除了封建残留,在黎塞留时期,“公共自由的根基”因“专制主义的手腕”而得以确定,“长期的放纵之后,这种手腕绝对必要”。马布利期待查理曼那样的民主派国王,莫罗则强调,黎塞留“缔造的政治体组织,比查理曼领导的组织更完美、更能促进自由”。<sup>⑥</sup>

莫罗也使用宪法概念,但他阐发的是支持绝对王权的宪法。就其对宪法的理解方式而言,他与勒佩奇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因为他同样认为宪法内在于法国的君主制之中,体现了法国国王与人民关系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阐发或发明的是另一种先定的、几乎是超历史的传统即绝对主义的传统,法国历史的起伏就是这一绝对主义宪法彰显与隐没的过程。像勒佩奇一样,莫罗也认为法国有一部“应该捍卫”的宪法,并不需要“创制”新宪法。<sup>⑦</sup>这是他们与马布利的不同之处,在后者看来,法国一直没有能确立真正的宪法。

上述三个版本的法国历史都涉及的基本角色:民族(nation,或译国民)及其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高等法院、国王。如果说马布利预言国民将在未来的民族大会中声张其政治意志的话,那么在革命到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勒佩奇所代表的高等法院就长期在舆论中占据优势地位。丹尼尔·莫尔奈在关于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的经典著作中评论说:“面对专断的王权,他们是唯一能够反抗的人,他们确实也进行了反抗,人们事先就认为他们有道理。此外,他们大谈哲学和人道,他们谴责专制主义,援引基本法、自由、理性和人道……人们把他们看作英雄和‘祖国之父’。”<sup>⑧</sup>法官们的政治话语中不仅有习以为常的司法套话,同样也受到了启蒙思潮的影响,如自由和理性的话语。不过,在法院贵族的理念中,宪法不仅是一种政治概念,还有重要的社会内涵,而这种内涵同样是以历史的名义言说的。

## 二、有机论宪法概念及其社会内涵

自1750年代以来,法国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不断

声称,他们在民族面前代表国王,在国王面前代表民族。<sup>②</sup>这个主张似乎赋予他们替民族发声的合法性。他们在挑战国王的“专断”时,总是强调传统、惯例,“在旧制度这个保守性、习惯性、成例性的世界中,存在之长久本身便带有合法性”<sup>③</sup>。1760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就试图证明它对国王的法令进行自由辩论并提交净谏书(remontrances)的权利,源自于法国的历史:

这个通过自由赞成而形成的,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君主制度的根本准则相一致的法律——高等法院是其受托人——随后又由君主本人确定过,还曾在同样的会议上获得了立法者授予的权威……<sup>④</sup>

从这种历史视角看,旧制度末期法国国王频繁采用“司法床”(lit de justice)<sup>⑤</sup>、强制登记法律的做法,违反了过去的惯例和基本法,剥夺了法官们的自由和权利。根据他们的理论家孟德斯鸠的见解,国王的强制会使君主制滑向专制主义。1763年5月“司法床”之后,法官们再次抗议君主的违法行径,并认为这样的登记没有法律效力:

本法庭……抗议昨天的新做法(innovations),无论是在表决方面,还是在强迫登记法令和宣言方面。这些登记违背王国的基本法,违背陛下臣民合法的自由和幸福,以及王权自身的权利和安全的依赖和保障……<sup>⑥</sup>

上面这段话中的 innovations(新颖、创新)一词很有意思,在法官们看来,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新举措并不可取,其习惯做法是从“君主制诞生之日”就存在的宪法中寻找合法性。在与国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经常使用这种话术。正如莫罗指出,法官们掌握了这方面的资源并熟知如何利用宪法话语。他们对宪法的见解与勒佩奇阐发的一开始就已成型、“同君主制一样古老”的宪法颇为接近。不过,在法官们那里,这一宪法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涉及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议事程序,还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可以通过18世纪围绕税制改革的争议,来观察宪法的这一社会属性。

18世纪的一项重要改革是王权推行所谓的“普

遍直接税”,国王试图让过去享有免税权的个人和群体缴纳更多的税款,尤其1749年设立廿一税(vingt-tième)之后,法国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不仅涉及特权群体的物质利益,也对旧制度的等级-团体秩序构成挑战,因为该项措施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负同等义务,<sup>⑦</sup>由此引发了法官们的抗议。不过,他们在为特权辩护时,运用的是宪法、自由、民族权利等原则。这里的宪法与前述勒佩奇等三位作者的宪法概念有一点不同,即前者明显涉及对旧式等级-团体社会的维护,而不仅是民族、国王和高等法院等权力机构的关系问题,所以必须对“宪法”概念做一点辨析。

大革命前的法国并没有成文的宪法或明确的“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sup>⑧</sup>,但并不妨碍人们频繁地谈论这两个概念。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当时语境下的宪法与革命者口中的宪法有区别。法国学者米歇尔·安托万(Michel Antoine)认为,宪法一词的使用尽管在17-18世纪日益频繁,但其意思并不是“国家的根本法,而是国家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体质(complexion),它分泌出政府的原则、行为方式和特殊的机构”。法国从本质上说是个君主制国家,它的整个历史都是这个本质的见证。<sup>⑨</sup>我们在勒佩奇关于法国历史的连续性神话中、在莫罗的绝对主义历史观中,就看到了这种宪法观念。当时的一些词典也证明 constitution 概念的复杂性。1694年的法语词典对这个术语的解释虽然涉及法律,但并没有明确是国家的根本法,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敕令(ordonnance)、法律(loi)和规章(règlement)。

从安托万的分析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更接近词典中对 constitution 的另一一些解释的挪用,即自然体(corps naturel)的组织方式和形态、人体的体质(tempérament 或 complexion)。<sup>⑩</sup>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中的解释与此类似:当 constitution 作为法学术语时,一般指对某种事物的确立或安排(établissement);从法学上,这个意义适用于各种对象(différents objets),从公债和嫁妆的确定到教会内部的各项法规。具体到政治法律,普遍的、复数的“宪

法”(constitutions générales)指的是君主的所有臣民都应遵守的敕令、条规(édits)和宣言(déclarations)。《百科全书》还特地说明:“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文件需要在高等法院和其他法庭登记,以便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明确法律。”<sup>⑧</sup>这一说明很可能是在经历1750年代的宪法危机和舆论战后留下的痕迹,接近法院贵族们对宪法的理解。

法国学者丹尼斯·里歇认为,在孟德斯鸠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在接近现代宪法的意义上使用过constitution一词,而此前对该词的用法,都不能完全契合于现代宪法。<sup>⑨</sup>基思·贝克在讨论革命初期的制宪问题时指出,18世纪后期人们对该概念的使用依然很模糊。18世纪的法语词典对于constitution的解释总在两种笼统的含义之间摇摆。第一种指的是设立或确定,也就是该术语在罗马法和教会法中最初的使用,意思是皇帝或教皇、国王或教会高层制定的法律和颁布的敕令。第二种强调某个实体的存在秩序(order)或者人体的构造,而且秩序往往被类比于人体构造。<sup>⑩</sup>这种含义接近于米歇尔·安托万的complexion,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有机论色彩的宪法理念,它在有关等级-团体制度和特权问题的论辩中体现得很明显,因为在法院贵族及其他保守派看来,这种结构及由此派生出的特权也是法国宪法的一部分。

有一份重要文献可以佐证这一点,就是1776年3月巴黎高等法院指控财政总监杜尔哥(Turgot)六项改革的谏诤书。它相当典型地展现了法官们对宪法的理解及其为特权辩护的法律及历史依据。杜尔哥曾计划将过去仅由部分农民承担的道路劳役(corvée),转化为所有人负担的捐税,这就损害了特权等级的“历史”和“宪法”权益:

从宪法(constitution)上说,法国这个君主国是由几个互有差异、互相分离的等级构成的。我国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身份地位和个人方面的差异;这是随我们民族的风俗一起诞生的,是君主与其臣民之间宝贵的联系纽带……我们无法生活在身份地位平等的状态中,必定要有人指挥,另外的人服从……

在由这些不同秩序构成的统一体中,“您的王国的所有人都是您的臣民”,所有人都有义务为国家所需作出贡献。但是,就在这种贡献中,也总能体现普遍的秩序及和谐。教士的职能是履行所有与教育、宗教崇拜有关的工作,并通过施舍来履行救济不幸者的职责。贵族的职责是以鲜血来保卫国家,通过建议(conseils)来襄助君主。国家的最后一个阶级不能为国家提供如此卓越的服务,只能以税赋、产业和体力劳动为国家效劳……

尽管所有人都同样忠诚和臣服于您,他们不同的身份状况却从未混淆过,从根本上说,他们服务之性质在于他们身份地位之性质……这些制度惯例并非偶然形成的,也非时间所能改变。若废除它们,必定会推翻法国的整个宪法(tout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人们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改变由这种制度建立的东西。但是,民族的天性、风俗和普遍意愿在一个帝国的形成,以及全部历史中造就的属于本质性的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sup>⑪</sup>

在法官们的观念中,宪法像是一种先天构造,不仅确定了社会的等级结构,甚至还规定着不同行业的高低贵贱。所以,宪法不仅分泌出政府应该遵循的规章、具体的立法程序,还是各种特权和职业贵贱的法理和心理依据。这一宪法“非时间所能改变”,人为立法也不可能改变体现历史和民族天性的根本性“宪法构造”。在这种语境中,宪法就成为捍卫等级-团体制度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的口实。在涉及社会问题时,宪法和历史互为支撑:法官们在强调宪法的同时,又连篇累牍地援引历史上的法律,来论证不应该对贵族和教士征税。<sup>⑫</sup>的确,法官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因为杜尔哥试图改变的就是历史先例,是必定会招致混乱的“创新”。因此,法院贵族的宪法话语具有两面性,从政治层面说,援引宪法意在约束绝对君主制,但在社会层面,这种基于历史传统的宪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平等原则。

教会和地方团体同样以宪法之名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1788年,法国教会在论证其税收豁免权

的“神圣起源”时,强调这是“自克洛维至今的主教会议和教士大会所要求的,也是过去的民族大会、三级会议和法官们决定的”,教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等级源自法国“古老的宪法”,而第三等级要求的“虚妄的平等”企图摧毁作为国家力量源泉的“差异和特权”。<sup>③</sup>1763年,埃克斯高等法院也以宪法和“自然法”为名,要求维护普罗旺斯独特的税收征管体系,拒绝王国政府的一体化政策。<sup>④</sup>

在这种局面下,宪法就成为特权等级和团体阻碍平等化改革的制约力量。当法官们尚能占据公共舆论的舞台核心时,这种矛盾在公共舆论中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矛盾。早在1750年,当教会以历史、宪法和自然法为自己的特权辩护时,伏尔泰已经用理性反驳以历史为依据的特权:“理性向我们显示,当君主要终结某种偏见陋习时,人民就应予以支持,哪怕陋习有四千年之久”。对于教会,历史中出现的权利才是自然权利,自然法就意味着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但是肖伟兰(Chauvelin)修士提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法:“自然法只能意味着所有公民的平等。”<sup>⑤</sup>1787年后,随着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以解决财政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围绕宪法展开的话语争夺进一步明朗化了。

### 三、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论争:宪法的有与无

178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就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颁布法令,规定会议的组成和表决模式应参照1614年的方式,即三个等级分厅议事,按等级表决,每个等级代表数量相等。这个决定被认为是革命前夕法国政治风向的重要转折点,第三等级觉得该法令是特权等级针对他们的阴谋。“六个月前,高等法院还是民众的偶像,现在每个人都憎恶它”,过去民众与法院贵族结成对抗国王及其专制大臣的同盟,现在则演变成“特权和自然法的战争”。<sup>⑥</sup>高等法院对三级会议的规定并不让人奇怪,这与它对宪法的理解存在明显的连续性。1788年12月5日,有位法官为9月的决议辩护说,1614年的形式是“多个世纪的先例所认可的”,高等法院不应应对“自然法和宪法有任何的冒犯”。<sup>⑦</sup>

美国学者戴尔·凡克莱曾以专文讨论这场“特权和自然法的战争”,论文的标题意味深长:“从法国历史的教益到所有时代和所有人民的真理:一部反历史的宣言的历史起源”<sup>⑧</sup>。他在文中考察了从1787年第一届显贵会议(Assemblée des notables)到1789年8月底《人权宣言》颁布之间法国舆论界的众多小册子,并将它们分为三类。笔者认为,这三类文本与基思·贝克阐述过的三种法国历史版本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第一类是“爱国小册子”,在1787年9月到1788年9月之间,法国问世的小册子数量超过一千种,大部分支持高等法院及其宪政主义传统。不过在莫普政变之后,勒佩奇论证过的观点已经被削弱,舆论界的风云人物塔尔盖(Target)等人虽然反对莫普政变,但也指出高等法院不能代表三级会议。<sup>⑨</sup>因此,三级会议作为民族大会的言论占据了主流。然而,在阐述国王和民族大会的关系时,他们大多继承了勒佩奇的思路,认为法兰克的制度在查理曼那里得到了完美的实现,民族大会行使主权,国王仅限于主持会议。此后封建混乱和王权的崛起,都导致民族不能恢复过去的自由,而大臣们的专制最终形成了路易十四时代的锁链。<sup>⑩</sup>

第二类是凡克莱所称的“内阁小册子”,秉持莫罗历史观的主要论点,歌颂王权的崛起,认为绝对君主制是确保民众福祉和自由的唯一堡垒,而法院贵族的宪法理论无非保护其私利的幌子。著名报人兰盖(S.-N.-H.Linguet)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者。<sup>⑪</sup>

第三类是持“民族综合论”的小册子。1788年9月24日法令彻底暴露了高等法院对宪法的贵族式理解,11月28日,法国的五位亲王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产生了重大影响。<sup>⑫</sup>他们在为高等法院的决议辩护时,攻击第三等级的平等要求是在制造国家的分裂,并声称“维持三级会议的唯一合乎宪法的形式(这一形式因法律和传统而变得神圣),维持等级差异、三个等级分厅议事、表决权相等这些法国君主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础多么重要”<sup>⑬</sup>。

凡克莱认为,这份由国王的兄弟们签署并大量

印刷的文件,很不幸地将绝对君主制与法院贵族的宪政主义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高等法院版本的法国历史中,宪法一方面维持特权等级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有制约王权之效,而在莫罗的宪法理论中,绝对王权是与市民(或第三等级)结盟压制贵族的。但在法国政治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国王的兄弟和堂兄弟,五位亲王的立场表明,绝对君主制根本上并不是平民的联盟者,而是特权等级的同谋。于是,上述两个版本的法国历史都应该受到谴责。所以从1788年秋到1789年初,法国公共舆论对其民族历史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国全部的过去都面临被诅咒的命运,民族只有在即将到来的三级会议上把握自己的命运,才可能摆脱过去的幸。实际上,此刻的话语已经与马布利在《法国历史评论》中阐发的法国历史观对接起来:法国历史并没有提供成功的政治范例,民族唯有把握时机才有可能重获自由。这正是当时西耶斯等人阐发的“民族综合论”话语的关键特征。<sup>⑤</sup>

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时期的话语转折,这就是关于法国历史上有无宪法的辩论。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在两个方向上运用宪法话语:在国王及其大臣面前宣扬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第三等级面前维护传统特权。但1787年第一届显贵会议之后,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三等级的政论家们开始突出这种话语维护特权和等级不平等消极方面,而过去一直被声讨的专制王权看来正在投降。

1788年8月,米拉波宣称:“对特权和特权者开战,这就是我的口号。特权在反对国王时是有用的,但对全体国民来说都是可憎的。”塔尔盖也说:“各省、各城市、各法庭、各团体和国家的各等级以它们的特权来反对国王,但在法兰西民族大会前请放弃它。”<sup>⑥</sup>这些表态清晰地勾勒出新的政治态势,“古老宪法”保护的特权已经完成其对抗绝对君主制的使命。正是在新的背景下,拉博-圣埃蒂安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他在反驳法院贵族的法学论据时说:

为了论证这些形式和法律的合理性,人们以它们的年代久远为依据。但一项法律的久远,除了能证明它的古老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人们还以既有为依据,但过去的拥有并不表示永久拥有的权利;否则,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即使它是弊政(abus),因为弊政也是既有的东西。人们以历史为依据,但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我们应该提防以既成之事来证明应为之事的怪癖,因为我们所谴责的恰恰是既成之事。<sup>⑦</sup>

第三等级要想在三级会议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从历史传统中是无法找到依据的,因为它所反对的正是“既成之事”。在这场争论中,“资产阶级很清楚,他们的力量的源泉不是来自过去”<sup>⑧</sup>。他们的权利诉求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如理性和指向平等的自然法。如果说第三等级也需要使用“宪法”和“自然法”这样的概念,它就必须以新的原则重新界定这些概念,反驳基于历史的宪法理论。

一些作者揭露了特权等级使用宪法概念维护自身利益的阴谋。萨拉维尔说:“人们总是向我们谈论宪法(Constitution),这个词是所有特权阶层的集合号,它们想用这个术语封堵我们的嘴:威胁它们的特权就是推翻宪法。”在这个“个别利益反对公共利益”的时刻,应该告知人民何为公民社会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droit naturel),而那些存在了十个世纪的弊政(abus),即便被认为“合乎宪法”(constitutionels),也不能构成真正的宪法(Constitution)。<sup>⑨</sup>作者显然区分了两种宪法,一种是特权等级口中的历史性宪法,另一种是依据普遍自然权利学说、尚待确立的宪法,前者指向过去,后者指向未来。

有的作者则根本否认法国历史上存在过宪法。沃尔内质问道:“我们的宪法在哪里?谁制定的?什么时候制定的?有哪些内容?”<sup>⑩</sup>塔尔盖也持这样的观点:众说纷纭的“宪法,不合宪法”,只是“一种十分模糊、十分混乱的观念……一个国家的宪法就是一套……有关立法和治理的规范……但我们能说法国现在有这样的宪法吗?”

在另一位作者看来,法国只是按照国王的意愿

盲目统治的。<sup>④</sup>在这些政论家的理解中,宪法应该是一套明确的成文规范,这不同于前文的有机论宪法概念。甚至后来的王政派政治家穆尼耶也说:“我们根本没有宪法……为了证明法国曾有宪法,就得在加洛林的令状集中去寻找,但这顶多只能证明我们曾经有过宪法。”<sup>⑤</sup>第三等级的另一位鼓动家瑟吕蒂则说:“贵族和专制主义的所有糟糕之处融汇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宪法。”<sup>⑥</sup>如果说法国没有宪法,现在只有民族可以制定宪法;如果有人坚持法国有宪法,民族也有权改变过时的宪法,这就是西耶斯在其著名的檄文中所阐发的观点。<sup>⑦</sup>

在当时的论战环境中,已经有人意识到,历史不仅不能给第三等级的权利诉求提供有力的论据,而且它本身的多样性可以给每种特权提供依据。在这种不确定性——正如可以存在三个查理曼一样——之中,最终的出路不应该在历史而应该在新的原则中寻找。<sup>⑧</sup>这种情形并非1788-1789年之交突然出现的。庞冠群认为,1770年代围绕莫普政变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历史话语,已经把根本法和历史传统的内涵掏空了。当历史不再是法国人参照的法典时,基于理性而非基于历史的、普遍适用而非为特殊利益辩护的自然法就成为新宪法的原则。<sup>⑨</sup>拉博-圣埃蒂安拒绝将法国历史视为准绳之后,便强调特权者口中的法律和宪法就是赋予其特殊地位以合法性的旧宪法,而制定法律的根本原则在于“理性、公平、善治和公共利益”。他还以法律的发展眼光驳斥高等法院的宪法连续性论点:每个法律都有自己的时代,基本法也要经历变革,这与马布利描述的法国历史的变动性吻合,制度的时间性成为革命者变革旧宪法的依据。甚至后来的反革命邓铁哥伯爵也认为,法律应遵循“真正的原则”,即理性始终要求的公民平等和政治自由。邓铁哥并不排斥援引历史,如果历史能够展现理性和自由的发展的话。这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哲学,其内在的发展演化理念也不同于勒佩奇式的宪法观。<sup>⑩</sup>

1788年11月28日亲王们的小册子的面世,大大推动了法国人对历史论据的彻底摒弃。不少人对从

历史出发寻找宪法和法律依据感到很愤怒。高等法院的法官曾竭力搜集历史档案,以支持他们的权力诉求。<sup>⑪</sup>前詹森派律师瑟吕蒂说,“我们应该遵循的是法国的幸福而不是档案”。<sup>⑫</sup>另一位作者认为,法国“多个世纪的无知和压迫”的先例应该抛弃,以拥抱现代理性的光明。<sup>⑬</sup>在他们看来,过去都是恶习弊政。一位名叫拉克莱泰尔(La Cretelle)的作者说,法国人不应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而应该致力于制定一部新宪法;如果所有历史文献能堆到一起,就可以一把火烧光,“这样我们的理性就不会在这些旧物什中迷失”<sup>⑭</sup>。米拉波甚至也曾原封不动地引用过这句话。<sup>⑮</sup>按照这种逻辑,法国人应该抛弃历史,凭借理性“创造”一部新宪法。

柏克曾说,法国人已经有一部宪法。<sup>⑯</sup>这的确也是部分法国人的看法。但1789年《人权宣言》在重新定义宪法概念的同时,也论证了创制一部新宪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毫无宪法可言。”(第16条)<sup>⑰</sup>这里的权利是基于现代自然法的公民平等自由权利,而分权则涉及政府行为的根本方式。因此,法国革命者理解的宪法,不再是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有机论的类比,而是确定个人权益、规范政府行为的明确法条。在高等法院的宪法话语中,权利是等级-团体社会的“体质”中派生出来的,“天然”就不平等,而在莫罗的绝对主义宪法观念中,王权享有不可分割的全权。这两种话语在努力从历史中寻找依据的同时,又都认为历史只是既有宪法的证明,但排除了时间进程中的演化变迁。法国革命者否定了两种宪法话语的社会和政治内涵,这个否定同时也意味着法国并没有宪法需要维护,而是需要从头创制一部宪法。对此,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有清晰的表述。他指责特权者在混淆宪法概念:

六个月来……法国只有一种呼声:我们没有宪法,我们要求制定一部宪法。而今天,如果我们不仅有了一部宪法,且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特权者的话,这宪法还包含两个突出的、不可更易的条款。第一条是公民区分为各等级;第二是在民族意志的形成

中,每个等级的影响力相等。<sup>④</sup>

西耶斯的说法道出了随后制宪会议的方向:创制一部否决既有宪法的新宪法。这一刻将是法国宪法史的零点时刻,民族大会将重置法国的历史。因此,有无宪法之争既是宪法概念之争,也是有关集体生活的时间性的斗争。旧式宪法规范着民族的整体生活并意图使其延续下去,新宪法的创制者将以新的原则重塑集体生活,从而实现与过去的断裂。新宪法将成为新的时间起点。

### 结语

卡尔卡松那、凡克莱、基思·贝克都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基本遵循了激进主义者的普遍理性原则,民族成为其宪法的制定者。但卡尔卡松那以很长的篇幅讨论了陈情书和大革命前其他文献中的中间道路:如何改进法国既有的宪法。他还认为,在中间派的理念中,国王有其一席之地,一个经常援引的古老的法律格言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句格言来自于864年秃头查理颁布的一道敕令:法律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国王的认可(*lex consensu populi fit et constitutione regis*)<sup>⑤</sup>。但中间道路没有占据上风,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我们可以尝试从前述三种历史话语出发,思考一下为什么埃德蒙·柏克青睐的渐进改良路径没有占据上风。

无论是勒佩奇还是莫罗,法国古老的宪法都有一种超历史的本质主义取向。他们的宪法概念事先就排除了随历史不断演变、丰富和改进的可能,历史只是某种既定宪法原则的展现。这与英国宪法和历史的关系不同,因为英国宪法肯定了历史演化的积极成果,如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分权制衡实践<sup>⑥</sup>——这正是《人权宣言》第16条强调的宪法精要。而一种意志主义的、基于理性原则的宪法观念已然在1750年代之后的政治话语中成型,这就是马布利的宪法概念:法国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宪法,但只要民族有意愿和勇气,便可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刻为自己奠定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sup>⑦</sup>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勒南(E. Renan)认为,法

国的自由主义完全植根于理性原则而排斥传统,这是它的错误所在。<sup>⑧</sup>这与柏克的指责异曲同工。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勒佩奇和莫罗的宪法概念中,历史和传统不是生动变化、富有创造性的主动因素,它们无视历史已经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而在1750年代的论战中,在莫普政变引起的宪法之争中,非历史的自然权利学说就已经成为一种竞争性的政治话语;当法国革命议会决定以新的自然法来创制宪法时,便很自然地走上了一条更具意志主义色彩的制度建设道路。<sup>⑨</sup>如果人们有理由指责法国革命者的宪法原则空洞抽象的话,同样的指责也适用于其论战对手对法国历史的理解,在后者那里,历史只是一个“空洞”的托辞而非演化创造的载体。

西耶斯等政论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战中抛弃法国的全部历史,也是对这种空洞僵化的历史和宪法话语的回应。法国的宪法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而是应该去创造的。新的观念改变了宪法概念的时间性:宪法不是过去的产物,而是构建未来社会的基础。这一时间性转变的根源既在于绝对主义和高等法院的宪法话语在革命前夕失去信誉,也因为新概念内化了基思·贝克所称“理性话语”。与经常援引古代城邦为典范的意志主义话语不同,理性话语是一种强调文明发展和公民社会进步的现代性话语。在旧制度末期,它追求国家的统一化以及公民的权利平等<sup>⑩</sup>,这否认了以历史为托辞的等级-团体制的社会关系,即有机论宪法中的社会内涵。当《人权宣言》重新定义宪法概念时,革命者就以扭转历史的意志重塑法国人的集体生活,从而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人可以依据理性、通过积极的意向性行动摆脱过去的羁绊。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对宪法等一系列经典概念的改造为现代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 注释:

①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6-82页。

② Rabaut-Saint-Etienne,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térêts du tiers-état*, Paris, 1788, p. 13.

③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p. 581-658.

④ Keith M. Baker, "Fixing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2-305. 该文的简略版见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主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制度卷》,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51-174页。

⑤ Marina Valensise,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Deb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Suppl., Sep. 1988, pp. 22-57.

⑥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34页。

⑦ 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话题,国内已有专著涉及,参见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基思·贝克阐述了1750年代法国“宪法”危机及相关的历史表述问题,参见Keith M.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06.

⑧ Daniel Mornet, "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 au XVIIIe siècle(1750-1780),"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7 année, No. 3, 1910, pp. 456-458.

⑨ François Furet, "Book Licens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Kingdom of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trans. by Jonathan Mandelbau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9-124.

⑩ Keith M. Baker, "Memory and Practice: 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

⑪ Keith M. Baker, "Memory and Practice: 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1-58.

⑫ Le Paige,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sur le droit des pairs, et sur les loix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 première partie, Amsterdam, 1753, pp. 13-35.

⑬ Le Paige,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Amsterdam, 1753, pp. 311-326.

⑭ 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⑮ Romain Telliez,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XI-XVe siècle*, Paris: A. Colin, 2009, partie 2, chapitre 4.

⑯ Le Paige,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Amsterdam, 1753, p. 274. 引者按:在法国的史学传统中,所谓第一“王朝”(race)指的是墨洛温王朝,第二王朝是加洛林王朝,而卡佩及其之后的王朝被称为第三王朝。

⑰ 参见庞冠群:《司法与王权》,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4-155页;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7-203页。

⑱ Marina Valensise,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Deb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Suppl., Sep. 1988, pp. 34-36.

⑲ 马布利对法国历史的阐述,参见Gabriel Bonnot De Mably, *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Tome 1-5, Osthafen: A. Kehll, 1788-1789.

⑳ Keith M. Baker, "A Script for a French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bbé Mably,"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6-106.

㉑ Marina Valensise,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Deb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Suppl., Sep. 1988, p. 48.

㉒ Keith M. Baker, "Memory and Practice: 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8-39.

㉓ Jacob-Nicolas Moreau, *Leçons de morale, de politique et de droit public*, Versailles, 1773, pp. 49-50.

㉔ Jacob-Nicolas Moreau, *Leçons de morale, de politique et de droit public*, Versailles, 1773, p. 60.

㉕ Jacob-Nicolas Moreau, *Leçons de morale, de politique et de droit public*, Versailles, 1773, p. 106.

⑳ Jacob-Nicolas Moreau, *Leçons de morale, de politique et de droit public*, Versailles, 1773, pp. 125-129.

㉑ Marina Valensise,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Deb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Suppl., Sep. 1988, p. 40.

㉒ Daniel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yon: Manufacture, 1989, pp. 488-489.

㉓ Keith M. Baker, "Representation Redefined,"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8.

㉔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s," in Keith M.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1, Oxford: Pergamon Press, p. 160.

㉕ Jules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Tome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5, p. 275.

㉖ 这个术语有的学者翻译成御临高等法院,参见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2-103页。

㉗ Jules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Tome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5, p. 339.

㉘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3-221页。

㉙ Denis Richet, *La France moderne: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Flammarion, 1973, pp. 37-54.

㉚ Cf. Jacques Revel, "Monarchie Absolue," in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ed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aris: Champion, 2007, pp. 299-300.

㉛ Académie française,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Chez Jean Baptiste, 1694, p. 238.

㉜ Denis Diderot, ed.,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Berne et Lausanne: Sociétés typographiques, 1782, p. 152.

㉝ Denis Richet, *La France moderne: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Flammarion, 1973, p. 38.

㉞ Keith M. Baker, "Fixing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4.

㉟ Jules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Tome 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8, pp. 287-288.

㊱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9-211页。

㊲ M. J. Mavidal et M. E. Laurent, ed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Tome 1, Paris: Paul Dupont, 1879, pp. 378-379.

㊳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7-238页。

㊴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24-235页。

㊵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 593.

㊶ Jules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Tome 3, pp. 780-781.

㊷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2-113.

㊸ 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1-233页。

㊹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0-84.

㊺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5-91. 关于兰盖与革命前夕的政治论战,另可参见 Jeremy Popkin, "The Pre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Keith M.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Pergamon, 1987, pp. 203-223.

㊻ 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1-303页。

㊼ P. Buchez et P. Roux, eds.,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 1, Paris: Paulin, 1834, pp. 256–261.

⑤4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1–97.

⑤5 Jean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UF, 1962, p. 334.

⑤6 Rabaut-Saint-Etienne,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térêts du tiers-état*, Paris, 1788, p. 13.

⑤7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p. 613–614.

⑤8 Jean-Baptiste Salaville, *De l'organisation d'un état monarchique*, Paris, 1789, pp. 4–6.

⑤9 Volney, *Des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à la légalité des états-généraux*, Rennes, 1788, p. 5.

⑥0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 616.

⑥1 Mounier, *Nouvelles observations sur les états-généraux de France*, Paris, 1789, pp. 182–184.

⑥2 Cérutti, *Observations rapides sur la lettre de M. de Calonne*, Paris, 1789, pp. 41–42.

⑥3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Paris, 1789, pp. 64–65, 68, 71.

⑥4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 613.

⑥5 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7–249页。

⑥6 Comte d'Entraigues, *Mémoire sur les états généraux*, Paris, 1788, pp. 17–18.

⑥7 Keith M. Baker, "Memory and Practice: 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3–40.

⑥8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3.

⑥9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 617.

⑦0 La Cretelle, *De la convocation de la prochaine tenue des Etats généraux en France*, Paris, 1788, pp. 11–12.

⑦1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p. 617–618.

⑦2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5页。

⑦3 原文是 *Tout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la garantie des Droits n'est pas assurée, ni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déterminée, n'a point de Constitution*。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ntenu/menu/droit-national-en-vigueur/constitution/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de-1789>。

⑦4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Paris, 1789, p. 125.

⑦5 MGH, Capit. 2, p. 313.

⑦6 Marina Valensise,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Deb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0, Suppl., Sep. 1988, pp. 33–34.

⑦7 Keith M. Baker, "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

⑦8 Elie Carcasson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p. 658.

⑦9 Keith M. Baker, "Fixing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8–305.

⑧0 Keith M. Baker, "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